附件

A. 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的解决

迈克尔·伍德爵士

导言

1. 这份提纲可能采用的一个专题，源自委员会之前的工作。大家记得，2011 年委员会二读通过了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1] 大会也注意到委员会的工作。[2] 早在 2002 年，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工作组便提到，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问题，“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改进解决这些争端的办法”。[3] 2010 和 2011 年，委员会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举行了辩论，对今后可能考虑的专题提出了各种建议。[4]

2. 拟议的专题应限于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争端的解决，[5] 其中包括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争端，但不包括国际组织不是当事方，而只是以某种方式介入其中的争端。在这个意义上，将不包括由一个国际组织主持解决的争端(例如联合国根据《宪章》第六章采取措施，参与解决会员国之间的争端)。同样，国际组织仅仅有某种关系，如成员国对该组织的章程的争端，[6] 也不在此专题范围之内。

3. 本文件的主要侧重点是国际性争端，即争端关系到国际法。它不涵盖涉及国际组织工作人员的争端(国际行政法)。它也不涵盖有关国际组织豁免权产生的问

[1] 《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10 号(A/66/10)，第 80-84 段。

[2] 大会 2011 年 12 月 9 日第 66/100 号决议。

[3] 《国际法年鉴》，2002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96 页第 486 段。

[4] 见 2010 年 7 月 29 日和 2011 年 5 月 31 日及 6 月 1 日全体会议的简要记录：文件 A/CN.4/SR.3070、A/CN.4/SR.3095 和 A/CN.4/SR.3096。委员会在 2010 年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说明(文件 A/CN.4/623)，2011 年收到了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工作文件(文件 A/CN.4/641)。

[5] “国际组织”一词的理解应沿循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中的定义(第 2 条(a)：“‘国际组织’是指根据条约或受国际法制约的其他文书建立的具有独立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国际组织的成员除国家以外，还可包括其他实体”)。

[6] 例如见对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管辖权的上诉案，《197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6 页起，见第 60 页第 26 段。国际法院在其中指出，“本案作为国家间的一般冲突提交本法院(也是这一冲突的起因)。然而在法院的诉讼中，实际上其中的一方所指责而另一方为之辩护的却是一个第三方实体，即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的行为。”

题。至于是否可包括一些带有私法性质的争端，如因合同引起的，或国际组织的侵权行为或对国际组织的侵权行为产生的争端，可留待以后做出决定。[7]

4. 这个领域如何选题，需要仔细斟酌。可以提出建议，对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争端，发展已有的和制定新的解决争端程序，和/或制定示范条款，收入相关的文书或条约。此外，委员会不妨研究 1982 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8] 看该宣言的条款可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组织。

拟议的专题内可能考虑的问题。

5.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困难，是解决所有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所共有的。这是由于国际组织在利用传统的国际争端解决办法上渠道有限，也因为由国际组织提出的和对国际组织提出的要求，在可否受理方面的障碍。另一方面，将传统的国家间解决争端机制用于国际组织，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国际组织不是国家。

6. 渠道：将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争端提交各国可以利用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各种困难，[9] 最明显的是，国际组织不能在国际法院的抗辩性案件中作为请求人或被告人，尽管在一些特定领域，其他一些常设法院和法庭向他们开放。仲裁仍是一个选项，但现有的实践十分有限，国际组织也很少受到管辖权条款的约束。可以采用法律以外的方法，如调解、和解和调查等，但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家，往往不属于方便进入该类程序的机构。例如，联合国或区域组织的成员国可将他们的争端提到一个政治论坛，从而借助多边政治力量和程序解决问题，如真相调查团。由于在第三方解决冲突机制方面存在这些障碍，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冲突，主要依靠谈判或组织内部的机制。

[7] 解决有关这类问题的争端，必须考虑国际组织享有豁免，以及在一些条约下国际组织有义务对解决争端的适当方式作出规定。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对这类案件规定采用包括仲裁在内的特别程序。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CAHDI)的议程上有一个项目：“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但带有私法性质的争端的解决”(见法律顾问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报告，斯特拉斯堡，2015 年 9 月 24-25 日，法律顾问委员会(2015)23,23-29 段)。法律顾问委员会在一份问卷调查中征求各国的意见，但尚未公布(CAHDI(2016) 9 prov.)。

[8] 大会 1982 年 11 月 15 日第 37/10 号决议。

[9] 原则上，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适应于国际组织没有争议(见“为联合国服务期间所受伤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74 页，国际法院在意见中讲到联合国可以对国家提出国际索赔)。这类机制，包括“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方]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另见 F. Dopagne, ”Les différends opposant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à un état ou une autr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in E. Lagrange and J-M. Sorel(eds.)，*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Paris：LGDJ, 2013)，pp. 1101-1120, at p. 1109。

7. 可受理性。由国际组织提出的和对国际组织提出的诉讼，在可否受理上所面临的困难，主要在于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和相应的用尽当地补救办法的要求。比如，国际组织能像国家维护其国民的权利一样，维护本组织工作人员的权利吗？再者，如果国家为维护其国民的权利向国际组织求偿，用尽当地(国内)补救办法的要求适用吗？

(a) 国际法院及其他常设法院和法庭

8. 《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四条第一款将法院的出庭权限于国家。[10] 尽管第二和第三款对法院和国际公共组织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作了规定，[11] 但这类组织仍不能在诉讼案件中作为当事方出庭。然而，联合国和授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在法律问题上寻求咨询意见。[12]

9. 鉴于法院规约中的这些限制，希望利用国际法院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所谓“具有约束力”的咨询意见，和要求修改规则。

10. 虽然咨询意见本身是不具有约束力的，但一些协定规定，采用咨询意见程序解决冲突具有“决定性”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1946 年的《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

> “如联合国与一个会员国间发生争议，应依照宪章第九十六条及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请法院就所牵涉的任何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当事各方应接受法院所发表的咨询意见为具有决定性效力。”[13]

---

[10] “在法院得为诉讼当事国者，限于国家。”

[11] “二. 法院得依其规则，请求公共国际团体供给关于正在审理案件之情报。该项团体自动供给之情报，法院应接受之。三. 法院于某一案件遇有公共国际团体之组织约章、或依该项约章所缔结之国际协约、发生解释问题时，书记官长应通知有关公共国际团体并向其递送所有书面程序之文件副本。”另见 2005 年增加的法院规则第四十三条第三和第二款。

[12] 《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13] 《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1946 年 2 月 13 日，纽约)第八条第三十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卷第 15 页。另见《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第九条第 32 节(1947 年 11 月 21 日，纽约)，《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1959 年 7 月 1 日，维也纳)，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74 卷 147 页；《关于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智利开展业务的协定(附换文)》第九条第 21 节(1953 年 2 月 16 日，圣地亚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14 卷第 49 页；《联合国与泰国政府关于在泰国设立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总部的协定》(1954 年 5 月 26 日，日内瓦)第十三条第 26 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60 卷第 35 页；均在 J. Sztucki 的“国际组织在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中作为当事方”一文中列举，A.S.Müller et al.(eds.)，*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The Hague:Nijhoff, 1977)，pp.141-167, at notes 24-25。

11. 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总部协定，在有约束力的仲裁方面设想了一个大体类似的程序，该协定规定：任何一方均可请求大会对仲裁过程中产生的法律问题提出咨询意见，仲裁法庭在作出最后裁决时“应予以考虑”。[14]

12. 然而，在现实中具有争议的问题上采用法院的咨询管辖权，存在明显的困难，对具有约束力的咨询程序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它不能替代国际组织直接诉诸法院。对咨询程序适用的管辖权规则过于宽泛。但又在其他方面过于狭窄，既破坏了当事方之间诉讼渠道的平等，又破坏了在解决某些争端上相对于其他方式的优先。

13. 这两个不理想的结果都是因为只有联合国和它的专门机构能够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15] 也就是说，在一个此类机构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只有该机构能够提出“要求”。当然，如果条约义务要求将争端提交咨询程序，联合国和专门机构都必须那样做。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事各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称的，因为“将问题提交法院要由一个具体的组织来决定，有关的成员国[或其他当事方]都不能掌控提交程序”。[16]

14. 同样，只有联合国和它授权的专门机构能够要求提供咨询意见，意味着利用咨询程序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将主要局限于这类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争端。当然，其他争端的当事方也可以请求大会或其他某个授权机构提出咨询意

---

[14] 《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1947 年 6 月 26 日，成功湖村)，第八条第二十一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 卷第 12 页：

“(a) 联合国及美国关于解释及实施本协定或任何补充协定之争执，如未能由磋商或其他双方同意之办法解决者，应提交三仲裁人组织之法庭取决。仲裁人之一由秘书长提名，另一由美国国务卿提名，第三人由秘书长及国务卿一同抉择，如双方不能同意第三仲裁人时，则由国际法院院长指派之。

(b) 秘书长或美国得就此项程序引起之法律问题请大会征询国际法院之咨询意见。于接获法院之意见以前，双方应遵从仲裁法庭之临时裁定。其后，仲裁法庭得参照法院之意见作成最后裁定。”

也见《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与加拿大政府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的协定》(1951 年 4 月 14 日，蒙特利尔)第七条第 31 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6 卷第 176 页。

[15] 《国际法院规约》第六十五条提到《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一. 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得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二. 联合国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其工作范围内之任何法律问题，得随时以大会之授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得到此授权的机构包括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大会临时委员会。得到此授权的专门机构包括劳工组织、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卫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国际开发协会、货币基金组织、民航组织、电信联盟、农发基金、气象组织、海事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工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尽管不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也得到咨询授权。见“得到联合国授权可请求咨询意见的组织和机构”，可登录：http://www.icj-cij.org/jurisdiction/index.php?p1=5&p2=2&p3=1(visited 29 June 2016)。

[16] K. Wellens, *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at p. 233。另见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享有法律程序豁免的争议，咨询意见，《199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2 页起，见第 81 页第 36 段。

见，但他们无法确定将确实寻求咨询意见，或者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寻求咨询意见。[17] 正如委员会自己之前已经指出的，这类咨询意见将是“不完美的”、“不确定的”，“让由此获得的咨询意见具有约束力，也将充满不确定因素”。[18]

15. 考虑到国际法院对解决有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冲突能力有限，[19] 在过去的几年里，曾经提出过很多修改规约的建议。1970 年，大会举行了“审议国际法院作用”的讨论，之后进行过一项调查，包括一个问题——“允许国际组织作为法院当事方的可能性”。在对调查作出的 31 份答复中(当时法院规约有 130 个缔约国)，15 个成员国作了肯定答复(阿根廷、奥地利、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麦、芬兰、危地马拉、伊拉克、马达加斯加、墨西哥、新西兰、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一个否定答复(法国)。[20] 1997-1999 年，大会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国际组织作用的特别委员会审议了危地马拉[21] 和哥斯达黎加的提案[22] ——允许国际组织诉诸国际法院。危地马拉在 1999 年收回了提案，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提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十分渺茫”。[23]

16. 各种提案回避了修订《规约》所带来的政治难题，而侧重对《规约》作任何修订给予国际组织请求国际法院咨询意见资格，在属人理由和属物理由范围方面的问题。

17. 与国际法院不同的是，在一些具体条约下运作的其他常设法院和法庭对相关的条约而言，对国际组织开放。例如，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海洋法国际法庭便是这种情况，[24] 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也是如此。

---

[17] 在这方面，见《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 年)第 66 条第 2 款中复杂的争端解决条款。

[18]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1980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87-88 页，第 9-11 段；《国际法委员会年鉴》，1982 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65 页第 4-6 段。上一个脚注表明，各国拒绝了这些建议，在《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中，不将法律咨询程序纳入其解决争端程序。

[19] 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案中，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必须对北约的所有成员国单独提出索赔，而不是对北约提出一项索赔，之后便有人提出了司法经济的考虑。

[20] 《审查国际法院的作用》，秘书长的报告，文件 A/8382(1971)，问题 III(a)，第 6 页，第 70-77 页，第 200-224 段。另见文件 A/8382/Add.1,第 6 页；A/8382/Add.3,第 4 页；A/8382/Add.4,第 3 页。

[21] 文件 A/AC.182/L.95 和 Rev.1(1997)。

[22] 文件 A/AC.182/L.97(1997)。

[23] 见 Wellens(上文脚注 16)，第 237-238 页；Ph. Couvreur, ”Développements récents concernant l’accè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à la procédure contentieuse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in E. Yakpo and T. Boumedra(eds.)，*Liber Amicorum Mohammed Bedjaoui*(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pp. 293-323, at pp. 302-322。

[24] 见 1982 年公约附件九，其中的第七条对国际组织与一个或多个成员国同为争端当事方的情况和共同利益方的情况专门作了规定。欧洲联盟曾经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第 7 号案—“东南太平洋箭鱼种群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案”中作为当事方(智利/欧洲共同体)。

(b) 国际仲裁

18. 仲裁是解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的国际冲突的一个有用的手段。它不仅可以避免在国际法院资格问题上的困难，而且还为当事方提供了一套灵活的制度，如有必要，能够保守秘密。

19. 以往也曾鼓励利用仲裁解决涉及国际组织的冲突，这种努力可以追溯到1964年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仲裁的决议，该决议：

> “提请所有国家注意利用国际仲裁庭解决各种国际性冲突，包括(a) 不能提交国际法院的国际冲突，……(c) 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冲突。”[25]

20. 同样，第六委员会关于联合国国际法十年的工作组在 1992 年也提出一项建议，“敦促更广泛的利用常设法院和法庭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冲突。”[26] 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国际组织在多大程度上必须或实际上能够将它们与国家或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性冲突提交仲裁。与国家不同的是，目前没有对国际组织开放的一般性条约，使国际组织能够接受将这类冲突提交仲裁的义务。可以肯定一些双边协定中载有此类条款。但是没有对国际协定中有关国际组织作为当事方如何提交仲裁的条款，或根据这类条款作出仲裁的情况进行过普遍调查。到目前为止，在公共领域，好像只有四起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的仲裁。[27]

21.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仲裁条款如何起草。现行的做法是包含以下行文的仲裁条款：

> “当事方之间因本协定产生的或与本协定有关的任何冲突，未能通过谈判和其他商定的解决方式得到解决，应在任何一方的请求下，提交一个由三名仲裁人组成的法庭。每个当事方应任命一名仲裁人，由此任命的两名仲裁人应任命第三位仲裁人，该人将担任仲裁庭的主席。如果在提出仲裁请求的 30 天内，一个当事方未能任命仲裁人，或如果在任命两名仲裁人之内的 15 天内尚未任命第三位仲裁人，任何一个当事方均可要求国际法院院长任命所说的仲裁人。仲裁庭应确定本庭的程序，条件是任何两位仲裁人即构成对一切问题上的法定人数，所有决定均须得到任何两位仲裁人的同意。仲裁庭的开

[25] 国际法协会，决议：国际仲裁，Int’l L. Ass’n Rep. Conf.，vol. 52(1966)，p. xii, para. 1。

[26] 文件 A/C.6/47/L.12(1992)，第 15 段。

[27] 向在法国定居的教科文组织退休官员支付的退休金税收制度(法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二十五卷，第 231-266 页；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法案例汇编》，第 105 卷，第 1-74 页。另一个最新的案例未作出裁决结案，是拉蓬塔市区(秘鲁)诉联合国项目事务厅(PCA Case No. 2014-38)(https://pcacases.com/web/view/109,)，还有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下提出的 *The Atlanto-Scandian Herring Arbitration*(丹麦王国因法罗群岛诉欧洲联盟)(PCA Case No. 2013-30(https://pcacases.com/web/view/25)，也在没有作出裁决的情况下结案。

支将由当事方按仲裁庭的摊派承担。仲裁结果将包含一份说明其理由的声明，并且将是最终的，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28]

22. 也可能会对程序提出问题。鉴于这些问题涉及仲裁规则，因此在常设仲裁法院对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仲裁任择规则(1996)基本上都已经作了规定。由于制定这些规则时已经考虑到涉及国际组织和国家的争端带有国际公法的性质，以及与这类争端相适应的外交惯例，[29] 因此委员会将 1958 年的仲裁程序范本规则加以修改用于涉及国际组织的争端或许还是有益的。

(c) 非法律机制

23. 国际法协会《关于国际组织责任问题的最后报告》出于对救济问题的侧重，提请人们注意“国际组织较不非式的行为”的“预防潜力”。[30] 相应地，其建议首先集中于在国际组织自身内部建立常设机制，包括监察员办公室，以及类似世界银行监察组的机构。[31] 对本专题而言，这种机制很可能仅在一国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下才有意义(相关论述，见下节)。

24. 如果委员会的工作侧重于解决国际法之下所产生的争端，则相关的非法律机制主要是第三方机制，例如调查[32]、调解与和解。委员会可考虑如何鼓励各方采用这种机制。这些机制虽然形式上属于非法律机制，但可在解决法律争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d) 主张的可受理性：职能保护

25. 之前几节已经论述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渠道问题。但是，即便存在渠道，仍然很可能产生与主张的可受理性有关的习惯规则如何对国际组织适用的问

[28] 采用类似规定的一些较新的协定包括：2010 年关于联合国减灾办公室在仁川设立办事处的协定；儿童基金会与埃及的协定；2010 年开发署分享服务中心协定；马来西亚政府与联合国开发署关于设立开发署全球分享服务中心的协定(2011 年 10 月 24 日，科伦坡)，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794 卷。较早期的仲裁条款，可参见《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1947 年 6 月 26 日，成功湖村)第 21(a)节，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 卷第 11 页。根据早期的这类条款提交仲裁的义务，有关分析见：在 1947 年 6 月 26 日《联合国总部协定》第二十一节下仲裁义务的适用，1988 年 4 月 26 日的咨询意见，《1988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2 页；和平条约的解释，咨询意见：《195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5 页起，见第 77 页。

[29] 常设仲裁法院，《常设仲裁法院国际组织和国家间仲裁任择规则》(1996 年)，见第七页。

[30]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Shaw and Wellens, co-rapporteurs)，*Final Report on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t’l L. Ass’n Rep. Conf.，vol. 71(2004)， p. 164, at p. 224。

[31] 同上，建议 2-5,见第 223-224 页。

[32] 国际法协会建议，国际组织“可考虑设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任何已成为公众严重关切问题的事项”(同上，建议 6,见第 224 页)。国际法协会特别提到《调查联合国在 1994 年卢旺达发生灭绝种族事件期间所采取的行动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S/1999/1257,附件)和《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53/35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A/54/549)(同上，见第 226 页)。

题。一个颇具争议的领域是，如何套用有关外交保护和用尽当地救济的习惯规则。[33]

26. 依照损害赔偿案的咨询意见，国际组织能够“为其代理人采取某种形式的保护措施”，[34] 大体上与一国为其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权利相似。由于这一类比，有人提出，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35] 也应适用于“职能保护”，一如其适用于外交保护[36]。

27. 然而，更仔细的分析显示，这一比较可能并不确切。国际法院在损害赔偿案意见中的推理与外交保护的理论基础颇为不同。一方面，外交保护源自国家“代表其臣民确保国际法规则得到尊重的权利”。[37] 这是一项国家享有的一般性权利，源自国籍的联系。而职能保护则是一项隐含的权力，是该组织履行自身职能的需要。[38] 因此它是一项有限的权力，范围仅限于代理人成功履行职责所需。

28. 与国际组织行使职能保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职能保护能否被用于向工作人员的国籍国提出主张。[39] 外交保护源自国籍，而职能保护源自职能方面的考虑，有鉴于这一差异，上述问题的答案可能是肯定的。[40] 在这方面，应当指

---

[33] 《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组织关于其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惯例：秘书处编写的研究报告》中简要介绍了 1967 年之前的惯例，A/CN.4/L.118 及 Add.1 和 Add.2(1967 年)，第 218-220 页，第 49-56 段(关于联合国)；第 302 页，第 23 段(关于各专门机构)。

[34] 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见第 184 页。国际法委员会外交保护条款草案，A/61/10 号文件(2006 年)将外交保护定义为“一国对于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通过外交行动或其他和平解决手段援引另一国的责任，以期使该国责任得到履行。”

[35] 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 14-15 条，同上，定义了外交保护背景下用尽当地救济这一要求的范围。

[36] 见 C. Eaglet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in *Recueil des Cours*, vol. 76, p.319, at pp. 351-352；Dopagne(上文脚注 9)， at p.1108；C. Trindad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vol. 57(1979)，p. 81, at pp. 82-83. Eagleton 甚至断言，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适用于联合国提出的所有主张，即便“在联合国声称自身受到一国损害时”也是如此(见第 352 页)。这源自一种错误的认识，即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不仅适用于一国为一国民行使外交保护的情况，也适用于对一外国造成的直接伤害。Amerasinghe 正确地指出，关于对国家造成的直接伤害，“若已经给组织造成了直接伤害，则[用尽]这一规则不适用”。参见 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nd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at p. 482。

[37] 马夫罗马蒂斯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案(希腊诉联合王国)，《1924 年常设国际法院案例汇编，A 辑，第 2 号》，见第 12 页。

[38] 见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见第 181-184 页。

[39] 参见外交保护条款草案，第 7 条(见上文脚注 34)：“一国籍国不得为同属另一国国民的人针对另一国籍国行使外交保护，除非在发生损害之日和正式提出求偿之日，该国的国籍均为该人的主要国籍。”

[40] 见 Amerasinghe(上文脚注 36)，见第 487-488 页。

出，马齐卢案和坎马拉斯瓦米案的咨询意见均涉及联合国与官员国籍国之间的争端。[41]

29. 若外交保护所针对的对象是国际组织，则会产生不同的关切。原则上，用尽当地补救的要求可以比照适用；在这方面，宜当谈及内部救济而非当地救济。[42] 然而，国际法学会在 1971 年的一项决议中表示了一种推定，即针对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的，不作用尽要求。[43] 还有人进一步提出，该规则源自“个人与应诉国之间的管辖权联系”，因此并不适用。[44] 在 1965 年和 1966 年联合国与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和瑞士之间的解决协定中，可以找到各国似乎行使了外交保护权的实例。在这些协定中，联合国同意向所涉国家的国民支付赔偿金，以补偿其在刚果的行动所造成的损害。[45]

---

[41] 见关于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诉讼程序豁免权的分歧，咨询意见(上文脚注 16)；《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六条第 22 节的适用性，咨询意见，《198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77 页。

[42] Jean-Pierre Ritter,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8(1962)， p. 427, at p. 454。

[43]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de Vischer, rapporteur)，*Les conditions d'application des règles humanitaires relatives aux conflits armés aux hostilités dans lesquelles les Forces des Nations Unies peuvent être engagées*(1971)，Art. 8:“Il est également souhaitable que si de tels organismes ont été désignés ou institués par décision obligatoire des Nations Unies ou si la compétence d'organismes semblables a été acceptée par 1'Etat dont la victime est un ressortissant, aucune réclamation ne puisse être introduite contre les Nations Unies par cet Etat avant épuisement préalable par la victime du recours qui lui aura ainsi été ouvert。”

[44] Amerasinghe(上文脚注 36)，at p. 486。

[45] 见：《构成联合国和比利时关于解决比利时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5 年 2 月 20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35 卷，第 199 页；《构成联合国和希腊关于解决希腊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 年 6 月 20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65 卷，第 5 页；《构成联合国和意大利关于解决意大利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7 年 1 月 18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88 卷，第 198 页；《构成联合国和卢森堡关于解决卢森堡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 年 12 月 28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85 卷，第 149 页；《构成联合国和瑞士关于解决瑞士国民对联合国刚果行动求偿案的协定的换文》(1966 年 6 月 3 日，纽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65 卷，第 195 页。另见 M. Guillaume, ‘La réparation d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es contingents français en ex-Yougoslavie et en Albanie’，AFDI, vo.l 43(1997)，p. 151；K. Schmalenbach, “Dispute Settlement(Article VIII Sections 29-30 General Convention)” in A. Reinisch(ed.)，*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A Commenta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p. 529-588, at p. 530。

参考文献选编

R. Ago, ‘Les avis consultatifs “obligatoires”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problèmes d’hier et d’aujourd’hui’, in Bardonnet, Combacau, Dupuy and Weil (ed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service de la paix,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Michel Virally* (Paris : Pedone, 1991), p. 9.

R. Ago, ‘“Binding”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JIL, vol. 85 (1991), p. 450.

C.F. Amerasinghe,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C.F. 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stitu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M. Arsanjani, “Claim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Yale J. World Pub. Ord.*, vol. 7 (1980-1981), p. 131.

O. Audéoud,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et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au sein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RGDIP*, vol. 81 (1977), p. 945.

G. Bacot, “Réflexions sur les clauses qui rendent obligatoires les avis consultatifs de le C.P.I.J. et de la C.I.J. ”, *RGDIP*, vol. 84 (1980), p. 1027.

M. Bedjaoui,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 bilan et perspectives*, address before the Sixth Committee, 24 October 1994, summarised in document A/C.6/49/SR.16 (1994), paras. 3-16.

S. Bellier, *Le recours à l'arbitrage par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L’Harmattan, 2011).

D. Bindshedler, “Le règlement des différends relatifs au statut d'un organisme international”, *Recueil des Cours*, vol. 124 (1968), p. 453.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Advisory Opinions and the Furtherance of the Common Interest of Mankind”,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p. 105.

D.W. Bowett, ‘To the Editor in Chief’, AJIL, vol. 86 (1992), p. 342.

Ph. Cahier, *Étude des accords de siège conclu entre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les états où elles résident* (1959).

Ph. Couvreur, “Développements récents concernant l’accè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gouvernementales à la procédure contentieuse devan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in E. Yakpo and T. Boumedra (eds.), *Liber Amicorum Mohammed Bedjaoui* (The Hague :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 293.

R.J. Depuy, “L’adaptation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au monde d’aujourd’hui”,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 (1966), p. 28.

Chr. Domincé, “Le règlement juridictionnel du contentieux externes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 Bardonnet, Combacau, Dupuy and Weil (ed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au service de la paix, de la justice et du développement: Mélanges Michel Virally* (Paris : Pedone, 1991), p. 225.

Chr. Dominicé, “Request of Advisory Opinions in Contentious Cases?”,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p. 91.

F. Dopagne, “Les différends opposant l’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à un état ou une autr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 in E. Lagrange and J-M. Sorel (eds.), *Droit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 LGDJ, 2013), p. 1101.

C. Eaglet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 *Recueil des Cours*, vol. 76 (1950), p. 319.

G. Fitzmaurice, “Enlargement of the Contentious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L. Gross (e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ew York: Oceana, 1976), p. 461.

G. Fitzmauric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ribunals”, BYIL, vol. 29 (1952), p. 1.

T. Furukawa, “Le double rôle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à l’égard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in *Mélanges offerts à Paul Reute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unité et diversité* (Paris : Pedone, 1981), p. 293.

L. Gros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onsiderations of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it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in L. Gross (e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New York: Oceana, 1976), p. 22.

C. Gray, *Judici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M. Guillaume, ‘La réparation des dommages causés par les contingents français en ex-Yougoslavie et en Albanie’, AFDI, vol. 43 (1997), p. 151.

M.J.L. Hardy, ‘Claim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spect of Injuries to their Agents’, BYIL, vol. 37 (1961), p. 516.

F. Hoffmeister, P. Ondrusek,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 International Litigation’, *Revue Hellén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61 (2008), p. 205

F. Hoffmeiste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2012), p. 77.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Huber, rapporteur), *Etude des amendements à apporter au Statu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1954).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Wengler, rapporteur), *Recours judiciaires à instituer contre les décisions d’organes internationaux* (1957).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l L. Ass’n Rep. Conf., vol. 52 (1966), p. xii.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chwarzenberger, rapporteur), *Review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l L. Ass’n Rep. Conf., vol. 47 (1956), p. viii.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Shaw and Wellens, co-rapporteurs), *Final Report on 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71 Int’l L. Ass’n Rep. Conf., vol. 71 (2004), p. 164.

C.W. Jenks,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London: Stevens, 1964).

C.W. Jenks, “The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Transactions Grotius Society*, vol. 32 (1946), p. 1.

R.Y. Jennings, “Comité restreint sur le règlement pacifique des différends: Note préliminaire”, *Annuaire IDI*, vol. 65 (1993-II), p. 281.

R.Y. Jenning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t Fifty”, AJIL, vol. 89 (1995), p. 493.

L. Jully, “Arbitration and Judicial Settlement: Recent Trends”, AJIL, vol. 48 (1954), p. 380.

J. Klabbers,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eltenham: E. Elgar, 2015).

E. Lauterpacht, *Aspect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Cambridge: Grotius Publications, 1991).

H. Lauterpacht, *International Law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Stevens, 1950).

H. Lauterpacht, “The Revision of 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 September 1955), edited by E. Lauterpacht and reproduced in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vol. 1 (2002), p. 57.

B. F. MacPherson, *World Court Enhancements to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Monograph No. 13 of the Center for UN Reform Education (1994).

B. Martenczuk,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and Judicial Review: What Lessons from Lockerbie?”, EJIL, vol. 10 (1999), p. 517.

J. Mousséé, *Le contentieux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Bruxelles : Bruylant, 1997).

A.S. Mul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Host States: Aspects of their Legal Relationship* (Boston: Nijhoff, 1995).

C. Parry, “Some Considerations upon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s in International Law”, *Recueil des Cours*, vol. 90 (1956), p. 654.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Optional Rules for Arbitration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96).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ncerning their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document A/CN.4/L.118 and Add.1 and Add.2 (1967).

A. Reinis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fore National Cou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A. Reinisch (ed.), *The Conventions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ts Specialized Agencies: A Comment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Review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document A/8382 and Add.1, Add.2, Add.3 and Add.4 (1971).

J.P. Ritter,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AFDI, vol. 8 (1962), p. 427.

A.M. la Rosa, “Links Between the ILO and the ICJ: A Less than Perfect Match”,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p. 119.

C.P.R. Roman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Judicial Process: An Overview”,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p. 3.

Sh. Rosenn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1920-2005*, 4th edition (Leiden: Nijhoff, 2006).

S. Schwebel, “Authorizing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to Request Advisory Opinions of the ICJ”, in Makarczyk (ed.),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Judge Manfred Lachs* (The Hague: Nijhoff, 1984), p. 519.

I. Seidl-Hohenveldern, “Acc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S. Muller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Nijhoff, 1997), p. 189.

F. Seyersted, “Settlement of Internal Dispute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urts”, ZaöRV, vol. 24 (1964), p. 1.

K. Schmalenbach,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Dispute Settlement” in J. Klabbers and A. Wallendahl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heltenham: E. Elgar, 2011), p. 251.

D. Sharooshi (ed.), *Remedies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eiden: Nijhoff, 2014).

P.C. Szasz, “Granting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us Standi*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S. Muller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Nijhoff, 1997), p. 169.

J. Sztucki,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Parties to Contentious Proceeding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A.S. Muller et al.(ed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ts Future Role After Fifty Years* (The Hague: Nijhoff, 1997), p. 141.

G. Thallinger,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ord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7 (2008), p. 401.

T. Trev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Parties to Contentious Cases: Selected Aspects”, in L. Boisson de Chazourne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2002), p. 37.

C. Trindad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sciences diplomatiques et politiques*, vol. 57 (1979), p. 81.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tudy on Widening Acc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June 1976), ILM, vol. 16 (1977), p. 187.

K. Wellens, *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L. Zollikofer, *Les Relations Prévues Entre les Institutions Spécialisées des Nations Unies et l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ustice* (Leyde : Sijthoff, 1955).